



“一带一路”倡议: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当代实践

何秋娟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区域合作的当代中国方案,用生动的实践全面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为原创性的区域合作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延续了中华文明原生性诞生方式;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当代形态,“一带一路”倡议创新了古丝路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作为“大一统”理念的当代形态,“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统一性;作为开放性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延续了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品格;作为没有暴力掠夺的合作长廊,“一带一路”倡议传承了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基于文明的视角阐述“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中国智慧,有益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中华文明;特性;当代实践

中图分类号:G125:D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3851(2024)02-0001-1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E Qiujuan

(Institute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plan to promote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 comprehensively explains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vivid practice. As an original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gra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intains the original na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a contemporary form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novate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spirit. As a contemporary form of the concept of "great unit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ighlights the outstanding un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an open platform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tinues the character of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As a cooperation corridor free from violent pl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herits the peace gen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alyzing the Chinese wisdom contain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will help us to grasp the "fiv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ore deeply.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civ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contemporary practice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1],并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凝练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论述引发了国内各界强烈反响。高蕾等^[2]从生态文明、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等方面阐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具体体现;夏春

收稿日期:2023-09-15 网络出版日期:2023-11-14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研究项目(23YBM18)

作者简介:何秋娟(1989—),女,湖南郴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意识形态、数字经济、中华文明等方面的研究。

涛^[3]、刘建军^[4]、张军^[5]、高江涛^[6]、张颐武^[7]等分别就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深刻内涵进行了阐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赋予了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底气和开放胸襟,赐予了我们不惧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决定了坚强统一的国度是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8]。“五个突出特性”为当下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9],是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身份证”和“识别码”^[10]。此外,有学者就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研究。王建新^[11]从历史传承、一体化发展、宗教信仰、古今中外结合等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中华现代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周玮等^[12]将中华文明喻为“根与魂”“精神命脉”,认为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

综上可知,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研究集中于其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而对于“五个突出特性”的整体性及其当代生动实践的研究则鲜少。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携手同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硕果累累,是凸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伟大实践。因此,本文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现实写照来探究“五个突出特性”的深刻内涵,同时以“五个突出特性”为理论依归来揭示“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深厚文明底蕴,以期更好地诠释“文明特性根源于实践,又通过生动实践展现出来”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一、“一带一路”倡议延续了中华文明的 诞生与认同建构方式

“一带一路”倡议既承古文明之精神,又应时代之需求,是当代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开放合作的产物,延续了中华文明的原生性诞生方式,同时开创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崭新文明观,延续了中华文明以交流促认同的方式。

(一)“一带一路”延续了中华文明原生性的诞生方式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没有断裂的文明。绝大多数世界古文明诞生于降雨量存在明显季节差异的河流两岸的平原地区(如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等)。因为在降水量具有明显季节差异的地域,人类必须要以复杂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协作的方式才能建立灌溉系统,才能发展

农业生产,获得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物质生产资料。正是在生产协作中,人类产生了意识、发展了语言,从而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开创了人类的文明史。正如马克思所言:“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3]¹⁶¹由此,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意味着人类的活动已不再是动物的本能活动,而是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人类已不再单纯地适应自然,而学会对天然产物进行加工来改造自然^[14]³⁸。可见,原生性的文明无不是在生产协作中产生的,“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3]¹⁵⁸作为世界古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同样诞生于农耕实践,正是在栽培水稻的生产实践中,古代中国人开始对天然产物进行加工,由此步入了文明时代。因此,从中华文明诞生形式来看,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的诞生并非基于对“假想敌”^①的畏惧,而是基于中华族群的早期农耕生产实践。中华文明是一种原生性文明,而非创生性文明。

“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开放合作的产物,延续了中华文明的原生性诞生方式。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推进,世界充满了不稳定与不确定性因素,“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够行稳致远,除了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外,还在于其回应了时代之需。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合作是实现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力,各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合作才能携手应对危机、互利共赢。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既为共建国家提供了具有历史底蕴与文化底蕴的区域合作平台,又展示了大国责任与担当,有力回击了“中国威胁论”。正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实践、中国积极参与并主动推动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实践、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实践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等催生了“一带一路”倡议。这种原生性的诞生方式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在百年变局中坚守初衷,不针对第三方,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始终坚守“为子孙后代创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15]的初衷。由此也决定了中国虽不是第一个提出复兴古丝绸之路计划的国家(2010年欧盟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2011年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但将古丝绸之路打造成为开放平等包容和平的区域合作平台,中国是首倡也是原创。

① “假想敌”出自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一书,原意为“主观预设的敌人”。

（二）“一带一路”延续了中华文明以交流建构认同的方式

中华文明之根是农耕文明，但中华文明并不是一元文明，而是多元一体的文明。多元文明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多元文明具有共性。中华民族文化共性是在民族融合进程之中形成的。民族融合过程也是不同文化交流交融的过程，各族群的融合与文化交流促成了各民族普遍认可的知识谱系（语言文字）、价值谱系（责任伦理）、实践谱系（大一统）的形成与发展^{[16]6-7}。华夏文明正是汲取多元民族的文化精魄，才逐渐演化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从国内民族融合的进程来看，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了华夏文明的感召力与凝聚力。近代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几欲面临断裂的危机。在危机关头，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度结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华，接受了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引，使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价值谱系与实践谱系得以完善与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扭转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赋予了中华文明新的生命力。基于国内民族融合与国内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可知，中华文明增强认同的方式不是树立“假想敌”，而是通过交流来增进认知、化解隔阂、促进发展、增强认同等。“一带一路”倡议的问世与推进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文明形势，“一带一路”倡议要在多元世界文明中获得认同，绝非易事。西方国家奉“文明冲突论”为圭臬，认为避免冲突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核心国家—同心圆”^{[17]4}文明秩序。在实践中，西方文明亦是依靠武力恫吓、政治施压、经济制裁、文化渗透等霸权手段来强制推行“普世价值”^[18]。“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崭新文明观，坚持交流而非霸权，坚持“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是在多元文明中达成共识的正确途径，在百年变局之下正确地回答了“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19]。“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通过文明交流促进了中国与亚非欧之间的相互认知，进而消除隔阂，达成共识，促进发展^[20]。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构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文明观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发展，又是对中华文明“以交流促认同”的文明观的延续与发展。

二、“一带一路”倡议创新了古丝路精神的内涵与外延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之所以突出，在于这种创新是以守正为前提的创新。“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区域

合作方案的中国创举，充分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一带一路”倡议既以尊古为前提，又超越了古丝路精神；既深化了古丝路精神的内涵，又拓展了其外延；既充分融入了时代精神，又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意欲复兴古丝绸之路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但真正超越历史、切中时弊、利好世界的复兴方案则非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莫属。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问世基于认同需要，更新了古丝绸之路的理念

古丝绸之路开辟于前互联网时代，东西方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相互认知提供了机遇，进而带动了东西方之间的经贸往来。“一带一路”倡议则诞生于全球化时代，一幅由世界各国、各地区密切联系交织起来的全球化图景越来越清晰可见。古丝绸之路的开辟更多的是基于对境外认识的需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则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21]。“一带一路”倡议的问世超越了认知层面，上升到了认同的高度。“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走向世界、在国际社会建构话语权、获取国际社会认同的重要创举，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成为“一带一路”合作平台的操控者。“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生效，不是中国凭一己之力所能实现的，而必须要与沿线各国各地区携手共建。各国共商共建共享，是推动“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写意”到“工笔画”、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21]转变的重要动力。共商共建共享的前提则是普遍认同的形成，即“一带一路”倡议既要符合中国融入世界赢得世界认同的需求，又要契合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殷切希望。十年来，“一带一路”朋友圈的不断扩容、从“陆锁国”到“陆联国”的转变、从“发展洼地”到“繁荣高地”^[21]的转变等用事实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认同而打造的繁荣之路。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基于融合，深化了古丝路精神的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秉承了古丝路精神，也沿袭了古丝绸之路的大致路线版图，但“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原封复刻，而是赋予了古丝绸之路新的内涵。古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唐朝都城长安一度成为各国使臣、商人以及留学生云集之地^{[16]18}。但古代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对商业一直存在打压

的倾向。古代东西方之间的经贸往来以农产品为主:如丝绸的输出、葡萄和胡麻等农作物的引进等。“一带一路”同样是经贸之路,但贸易对象由农产品为主转变为以工业品、数字信息产品等为主;且“贸易畅通”只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以“贸易畅通”带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真正的区域合作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不仅仅是经贸渠道,更重要的是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给沿线国家带来机遇,但机遇要变成实实在在的利益则需要各国主动参与、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图”是由沿线各个国家、各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共同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商贸之路、和平之路,更是一条人文交流之路,既厚植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的历史土壤,又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同时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范围具有延展性,拓展了古丝绸之路的外延

古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以古代中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主要连接东亚、中亚、西亚以及欧洲;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广州出发,连接东南亚与南亚地区。但农耕文明是一种内向型的文明,致使古代中国并未真正放眼世界,也没有真正重视海洋。在古代中国虽然海陆丝绸之路并存,但并未出现“海陆同盛”的局面^[22]。古代丝绸之路开辟更多的是基于巩固边疆的需要,而非出于开放发展的需求。因此,古丝绸之路覆盖的国家与地区是有限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就是“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21]。新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沿袭了古丝绸之路大致版图的基础上,还将东南亚、南亚、东亚、西亚、中亚以及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给予了海洋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应有的地位,致力于打造“海陆同盛”的当代丝绸之路盛况。“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理念上真正突破了农耕文明的内向性,而且在外延上突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国际合作的束缚。“带”与“路”并不是僵化的路线^[23],而是一个宽泛的空间地理概念,具有无限的延展性,可以延伸至任何爱好和平与合作的国家与地区。得益于范围的延展性,“一带一路”倡议的“朋友圈”不断扩容,截至2023年8月,“中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4]。

三、“一带一路”倡议传承了 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

“大一统”理念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价值理念^[5]。自古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就是基于民族融合,而非武力与暴力。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中国的“大一统”必然不是无差别的统一,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求同存异之下的和而不同,而非暴力压制之下的同而不和。历朝历代统治者要实现并继续“大一统”的局面,就必须处理好多元民族之间、君民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正是在追求“大一统”的实践中,中华民族探索并建立了充满智慧的民族交流之道与国家治理之策。古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形成的“丝路文化”就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交流原则。新时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承了古丝路精神,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以和平与发展作为统领多元文化的时代主题,推动文明交锋交融;以“天下为公”实现“天下大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由共建走向共享,由共享走向“大同”。“一带一路”倡议延续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理念,将“天下”由中国推及世界,将国家一统上升为人类命运一体,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一)“一带一路”倡议以谋和平促发展为“文化一统”的正统

在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中,“文化一统”是基础,也是核心^[25]。中国自先秦孔学起就存在“大一统”的观念,孔子主张“以文化人”,反对武力征服。在周王朝时期,形成了明确的政治“大一统”思想,强调周天子统领下的政治秩序具有正统性与合法性。秦始皇从政治上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同时“书同文”“行同伦”等文化制度的实施为“文化一统”发展奠定了基础^[26]。汉代之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就形成了“政治大一统”与“文化大一统”互相促进的局面。“政治大一统”主要依靠武力,但也需要“文化大一统”来推动。“文化大一统”强调的是文化的正统性,但这种“正统性”并非依靠政治力量自封,而是以文化认同作为统一的根基。换言之,“文化大一统”靠的是“礼乐”“仁义”等文化的濡化,而非武力征服。以“礼”与“仁”为精神内核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长期在封建社会占据正统地位,除了统治者的力推外,更重要的是儒家主张四海之内亲如一家的仁爱之心,能够获得多元文化的认同。因此,“文化一统”强调的是以认同为基础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一

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与归宿并非一统天下,而是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同,以文化共性作为“正统”来实现文明融合,进而构建认同共同体。全球化时代,到底是否存在西方所谓的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世价值”?“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地区的难民危机、“橙色革命”给乌克兰带来的动荡等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西方的“普世价值”绝非救世良方。“一带一路”倡议谋求建立的普遍认同绝非“普世价值”,而是从各国各民族最迫切的愿景中析出共同愿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下,“一带一路”合作汇集着共建国家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朋友圈不断扩容、合作协议落地生效的也必然是和平与发展的实践。正如恩格斯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27]“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文化交流与民心相交的“正统”,以这一“正统”统领多元文化,在尊重多元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和平相处、合作共赢;以这一“正统”统摄全局,向一切爱好和平与发展的国家与地区敞开大门。正是因为继承与延展了中华文明“文化一统”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在多元文明争鸣的时代,实现多元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将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明底蕴的国家与地区吸纳入“圈”,共襄伟业。

(二)“一带一路”以仁及天下为“天下一统”的正统

“天下大同”是古代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天下”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实践的发展,其外延与内涵不断变迁。古人对“天下”的认知虽非一成不变的,但对于“天下观”则始终坚守“大同”的理念。“天下大同”主张以仁爱治国,以仁爱外交等。“仁政”是儒家最鲜明的政治思想。在国内治理上,儒家主张“仁政”与德治,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等;在国之交上,儒家同样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推及整个世界的“仁爱观”。在国之交上,道家坚持“唯国是务,乃和而不同者乎”“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即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可见,古代中国的“天下一统”主张国之交要互相扶持、互相尊重,避免冲突与斗争,以仁爱实现文明交融,构建囊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文明“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天下观。面对新时代如何实现

“天下大同”的时代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卓越的智慧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天下为公”的姿态来实现“天下大同”。“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中国以自身成功经验造福于世界的“为公”举措。改革开放是中国摘掉积贫积弱旧帽、换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装的重要法宝。成功崛起的中国并未忘本,亦未膨胀,而是坚守“为公”的初心,以自身的“达”造福于全人类。通过“一带一路”开放合作平台,一方面中国将成功经验(如蛇口经验等)复制到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国家与地区,带动其有效脱贫致富;另一方面通过多元化合作,“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搭乘了中国发展的“快车”与“便车”,实现了赶超式发展。如,通过搭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28],老挝等“路锁国”变成“陆联国”,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内陆国拥有了出海通道,非洲国家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中国正是秉承“达则兼济天下”的“天下为公”理念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由共建走向共享,由共享走向大同。“一带一路”倡议不仅用处世哲学,而且用铁一般的事实证实了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而言是机遇,而非威胁,“中国威胁论”不过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判与抹黑。

四、“一带一路”倡议弘扬了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品格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频繁的文化交流实践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古丝绸之路的开辟,带动了东西方之间的经贸往来,同时也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人文交流。近代以来,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推动中华民族开眼看世界,汲取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之后,中华文明迎来了与世界文明平等对话的崭新时代,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外延由国内民族融合拓展到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成为新常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由外延的拓展转变为内涵的深化。一方面,中华文明主动从世界其他文明中汲取营养,不断培育和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主动承担“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赋予世界文明以中国智慧等。“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区域合作新方案,它既弘扬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又赋予了这种包容性新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一)“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中华文明的突出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回顾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先秦时期就有不同诸侯国之间的“交聘”^①;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原民族与西域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与中亚西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重要交通要道,促进了东西方民族之间的交往;唐朝时期出现了“唐蕃会盟”“华夷一体”“胡汉共朝”等民族交好交融的盛况;明朝郑和下西洋,增进了中华民族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国家之间的认知,促进了贸易往来与人文交流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虽遭受外来民族的侵略与奴役,但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历史取向并未改变。中华民族正是在与他国交往中找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正确道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更加宽广的胸怀主动融入世界,不断扩大与世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的范围,同时积极主动为促进世界各民族之间更好地交往交流贡献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促进世界各民族平等交往的重要平台,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一带一路”倡议不以发展水平划线,与一切有合作愿望的国家及国际组织开展交往交流,是真正开放性的区域合作方案。截至2023年8月,中国已与152个国家以及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了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长廊。这些国家既有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国家(尼泊尔),也有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新加坡、以色列等),而大部分国家则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整体呈现出“倒梯形”结构。对于处于不同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制定了不尽相同的合作方案。但不管是哪一种合作方式,都以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为前提与根本遵循。“一带一路”倡议“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21],愿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开展交流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在价值预设上并不针对第三方,合作的建立是基于互利共赢,而非打压共同敌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的是伙伴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其合作模式也不是封闭的,不仅限于双边合作,还有多边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主打一个“通”字,即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28]。政策沟通是“五通”的前提与基础,政策相通的前提则是摒弃冷战思维,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格局,畅通欧

亚,连接东西,充分展现了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与恢廓大度的开放性,用实践书写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二)“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了不同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中华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兼收并蓄就包括对多元宗教的“浸润”^[29],通过“浸润”促成了多元“宗教在中国”向“中国宗教”的成功转变^[30]。唐朝时期,中国引进了佛教文化,促进儒、佛、道在中国融合,使得佛教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16]¹⁸。明清之际,伊斯兰教与儒教实现了“伊儒会通”,“以儒诠经”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同样与儒家思想进行了结合,“儒教释耶”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华文明始终以“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来“浸润”外来宗教,不断地促进外来宗教适应中华文明的沃土。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31]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新理念新方案,当前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形成多元宗教并存的和谐格局。同时,中国还积极为区域合作营造和谐的宗教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海外营造和谐宗教环境的成功典范。“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地域范围较广,导致其面临着复杂的宗教环境。但即便如此,“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地将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从宗教信仰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宗教环境总体上良好,不同宗教交叉重叠存在的地域较少。东正教主要分布于“一带一路”北线B,基督教主要分布于北线A,伊斯兰教主要分布于中线与中心线,佛教主要分布于南线。但“一带一路”倡议沿线也涵盖了世界宗教形势最复杂的西亚地区,潜在的宗教矛盾与宗教冲突是现实存在的。如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世界的和平稳定(如IS等恐怖组织等)。“一带一路”倡议沿线有26个国家的人口以穆斯林为主,“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并未引发这些国家的不满,而是获得了认可与好评。2023年7月,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发言人、政治局委员阿里·穆赫森就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将造福于两国人民^[32]。宗教虽然是唯心的,但宗教教义大多主和不主战,宗教之所以会成为战争与冲突的导火索

① 《说文》中“聘”为“访问”之意,“交聘”意为友好交流访问。

是因为不同宗教之间、宗教与世俗社会之间的不理解、不尊重等。“一带一路”倡议合理地利用我国与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现有的宗教渊源,促进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和谐发展;加强与伊斯兰教的友好往来,增强儒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相容性,共同应对极端宗教组织的迫害,避免直接的宗教冲突,为区域一体化建设营造和谐的宗教环境。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够落地生效、行稳致远,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多元宗教信仰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正是基于理解与尊重,“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地打造了不同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三)“一带一路”倡议延续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源泉。中华文明之所以历久弥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兼收并蓄、厚德载物的突出包容性。自秦汉以来,古代中国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为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区域发展空间^[33]。国内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融:如赵武灵王推行胡服,教练“骑射”;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汉姓,通汉婚;唐朝洛阳家家学胡乐,各色衣冠聚长安;耶律楚材以儒治国,推行汉制等。国际上有东西方文化的互鉴:汉有佛教东传,唐有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宋元形成了东西方宗教多元并存、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奇迹;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34]。“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之路,打破了“文明冲突论”,秉承平等的文明观,以文明共存超越了文明优越,实现了多元文明的和谐共生^[20]。“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35]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源于误解,要避免文明之间发生冲突,就必须打破旧的“核心国家一同心圆”^[17]^[171]文明秩序,坚持交融的文明观。“一带一路”倡议以经贸合作为主体,但人文交流交融是立足点。特别是随着网络互联互通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e带e路”^[36]多渠道多领域全天候地促进了沿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古代丝绸之路曾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而“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贸之路,更是文明交流互鉴之路。“一带一路”倡议弘扬

了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合理理念,摒弃了“文明冲突论”,坚持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实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发展态势。如老挝铁路的开通推动老挝由“路锁国”变成“陆联合国”,激活了当地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活力等;“一带一路”倡议弘扬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胸襟,坚持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各个文明都有可借鉴之处,积极主动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汲取其他文明的养料,打破了文化交往的壁垒^[37]^[470]。如与东南亚国家“水涨荷花高”、非洲国家“独行快,众行远”等思想文化进行交流互鉴,形成了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弘扬了中华文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情文化^[38],坚持文明交流是对等的、平等的、多元的,而非强制的、单一的、附带政治条件的等^[37]^[469]。如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痛恨欺凌与奴役,同时也不会欺凌与奴役他国。“一带一路”倡议既延续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又开创了交流互鉴的新文明观。

五、“一带一路”倡议传承了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崇尚和平,坚持“以和为贵”的理念,不主战不尚武。无论是古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还是郑和七下西洋,中国的对外交往交流始终没有侵略、没有殖民。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欺凌与奴役,但重新崛起的中国没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依然坚持和为贵的外交理念。长期以来,中国既努力营造自身发展的和平环境,又以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贡献给世界区域合作方案,又是中国维护与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倡议继承了古丝绸之路以和为贵、文明交流交融的精神,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途径。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互惠共赢之路,而非暴力掠夺之路

和平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血液的基因,“尚和”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底色。新时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承了古丝绸之路亲诚惠容的理念,从价值预设到方案推行没有任何暴力色彩,是一条真正的和平之路,以和平合作传承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基因。当今世界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并不太平。百年变局,最大

的“变”是西方国家的普遍衰败与非西方国家的强势崛起所引发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面对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西方社会涌现普遍的焦虑与惶恐。在世界局势的新一轮洗牌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孤掌难鸣，个别国家甚至大搞单边主义^[39]，逆全球浪潮迭起。与此同时，“变”还突出表现为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模式诞生与迭代。与传统经济模式不同，新经济模式的核心驱动力不再是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而是信息与知识。大变局之下，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引擎。“变”意味着机遇，同时也意味着新的风险与挑战。近代中国饱经凌辱，但当下中国已强势崛起，面对国际局势的新一轮洗牌，中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忧虑。“一带一路”倡议的问世则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姿态与决心。“一带一路”倡议由“大写意”到“工笔画”、由规划图到实景图的转变、由区域合作到人文交流的深化、由小规模合作到朋友圈扩容、由中国梦到世界梦的对接等都用铁一般的事实证实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开放性与包容性。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共建共享之路，而非“零和博弈”之路

“文明冲突论”坚持不同文明无法兼容、文明强必霸的观点。固守冲突的文明观，在国际合作中，西方国家奉行“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认为不同文明之间不仅不能互利共赢，而且还会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也是美国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如美日同盟等）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重要缘由。中华文明一直主张“和而不同”“天下大同”，认为不同文明最终是趋同的。当今时代，从价值诉求上看，不同文明的共同诉求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从现实需求上看，不同文明的共同诉求是和平与发展。坚持和合文明观，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坚持“西夷可使如一家”，主动与世界其他文明交往交流，在吸收借鉴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古丝绸之路正是东西方文明跨越文化壁垒、交流交融、共同繁荣的历史见证。而新时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用丰硕的合作成果向世人证实了和平与发展是不同文明共同的诉求，不同文明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可以以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为纽带开展务实合作，实现共建共享。经过十年的摸索，“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由原初的理念“大写意”转变为实践的“工笔画”，而且画卷越来越精细清晰，合作领域越来越广泛，囊括政策、经贸、投资、金

融、健康、生态、数字、创新等诸多领域；合作模式越来越精细化，由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向中、小、微项目拓展深化；合作成员国越来越多，由区域的合作方案升级为当今世界上深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等。成熟的机制与成型的框架等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伙伴共建共享的产物。共建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是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建设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生效是关系到成员国自身发展的事情。共享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给共建国家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利益均沾，而非一家独享。共建共享理念跳出了“零和博弈”的困境，实现了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用事实驳倒了“文明冲突论”，证实了文明趋同的发展规律，弘扬了中华文明以和为贵的和平特性。

（三）“一带一路”倡议是圆梦之路，而非筑墙之路

中华文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往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以和为贵”的交往哲学。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绝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新时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用开放合作、文明交流互鉴实践书写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交往伦理。当前，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困境，西方国家不是“破冰”，而是“筑墙”，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逆全球化浪潮迭起。西方国家的筑墙之行，是西方文明衰退的表现，也是西方文明意图重振世界霸权的举措。然而违背历史规律，必然自食恶果，西方国家既未再次伟大，也未阻挡东方文明的强势崛起。“一带一路”倡议从人类共同命运和整体利益出发^[39]，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其他文明视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坚持文明和谐共生的理念，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梦与世界梦并不冲突，中国梦与世界梦可以实现完美的对接。从国内方面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强劲抓手，平衡了“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有效规避了“中等收入陷阱”。从国际方面看，“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缩小了亚太内部各国发展差距，实现了各国的普遍繁荣与持续发展；同时继承古丝绸之路以和为贵、文明交融的精神，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途径^[38]。可见，“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伟大复兴“中国梦”与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的完美对接^[24]。“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

平的基础。”^[39]“一带一路”倡议用辉煌的十年证实了“一带一路”是繁荣之路,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崛起,也与世界分享了中国发展机遇,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39];“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促进了共建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保障了沿线地区形势的和平稳定;“一带一路”是共享之路,源于中国,惠及世界,利在千秋。“一带一路”倡议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的崛起和复兴不仅不会对其他文明造成威胁,而且还能给其他文明的发展带来机遇。

六、结 语

“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与浓厚的世界情怀,“为人类社会进步汇聚文明力量”^[39]。本文从“一带一路”倡议延续了中华文明原生性诞生方式与以交流促认同的方式、创新了古丝绸之路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传承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弘扬了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品质、传承了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了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当代实践。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研究成果集中于科学内涵的阐释与重要意义的探讨,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来探究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当代实践虽然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但也具有一定的难度。其一,阐释“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继承与发展需要以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深刻内涵与内在逻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文明记忆与时代使命为前提,因此需要以大规模、高质量的文献研究作为研究基础。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在史料与国际文献检索方面存在覆盖面不够全面的问题。其二,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是一个内涵深刻、体系庞大的有机整体,而“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项历经十余载的重大实践,受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并未对“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的中华文明智慧与精神气质进行全面的论述。后续将致力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生成逻辑以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当代实践的其他载体研究,如人类命运共同体、“e带e路”、生态文明建设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2] 高蕾,孙少龙,董博婷.从中华文明连续性看“必然走自己

的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论述之二[N].人民日报,2023-06-13(006).

- [3] 夏春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J].红旗文稿,2023(12):20-22.
- [4] 刘建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J].红旗文稿,2023(12):23-25.
- [5] 张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J].红旗文稿,2023(12):25-26.
- [6] 高江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J].红旗文稿,2023(12):26-29.
- [7] 张颐武.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J].红旗文稿,2023(12):29-31.
- [8] 本报评论员.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N].光明日报,2023-06-06(01).
- [9] 本报评论员.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23-06-06(001).
- [10] 本报评论员.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评论之二[N].湖南日报,2023-06-26(01).
- [11] 王建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5-17.
- [12] 周玮,王鹏,徐壮.疏源浚流 与古为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系列论述之一[N].人民日报,2023-06-12(002).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N].人民日报,2023-10-19(002).
- [16] 姜义华.世界文明视阈下的中华文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 [17]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 [18] 斯琴格日乐,刘建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霸权的生成与解构[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26-37.
- [19] 肖燕飞.“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J].社会科学家,2022(9):26-32.
- [20] 习近平.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13.
- [21] 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N].人民日报,2023-10-19(002).
- [22] 王义枢.论“一带一路”的历史超越与传承[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9):19-27.
- [23] 肖怀德.从古丝绸之路到新丝绸之路:一种跨文化研究

- 视角[J].西部文艺研究,2023(3):13-17.
- [24] 新华社.我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EB/OL].(2023-08-24)[2023-11-07].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8/content_6899977.htm.
- [25] 都永浩,王禹浪.“大一统”思想: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线[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2):66-84.
- [26] 刘余莉,程丽君.“大一统”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2(8):20-28.
- [2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4.
- [28] 习近平.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系列讲话[EB/OL].(2019-04-28)[2023-11-07].<https://www.yidaiyilu.gov.cn/p/88249.html>.
- [29] 郑筱筠.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机制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J].中国宗教,2023(7):11-13.
- [30] 谢玲.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宗教的几点思考[J].中国宗教,2023(7):56-57.
- [31] 本报评论员.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1-12-06(001).
- [32] 高宇婷.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发言人: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EB/OL].(2023-07-14)[2023-11-07].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850269.
- [33] 中国历史研究院.以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J].当代世界,2023(10):4-9.
- [3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58.
- [35]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28(003).
- [36] 杨学成.中国互联网的“e带e路”[J].通信世界,2017(16):8.
- [3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38] 肖燕飞.“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J].社会科学家,2022(9):26-32.
-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N].人民日报,2023-10-11(010).

(责任编辑:陈丽琼)